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 HANXUE LUNCONG

〔美〕朱学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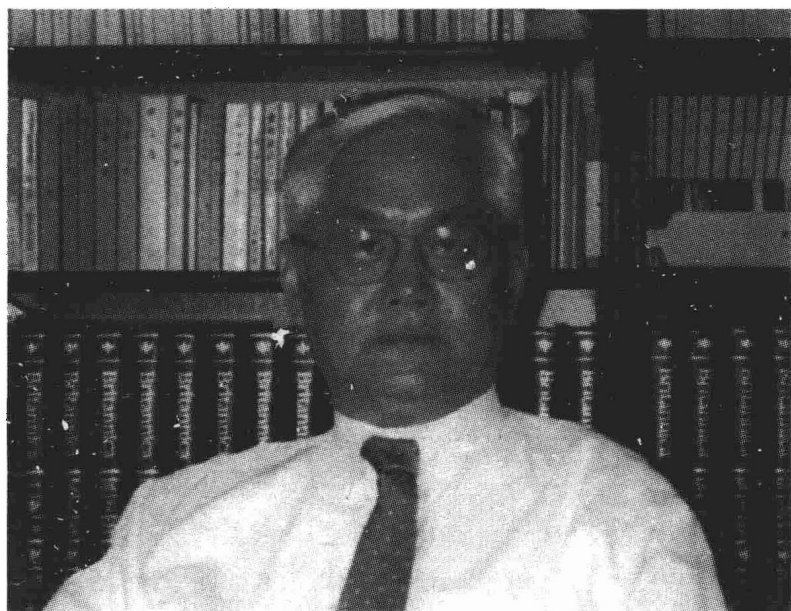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美)朱学渊著,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3336-9

I. 中… II. 朱… III. 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809 号

书 名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编 著 者	(美) 朱学渊 著
责任编辑	柴剑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½ 字数 22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336-9/K·1440
定 价	17.00 元



朱学渊博士,1942 年生于中国广西桂林,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载。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83 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 年前曾于美国能源部属下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涉及固体物理诸多理论课题。后入美国籍。朱学渊博士以其自然科学学力,却有志于人文科学的探索。他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解决一些争论不休的历史、语言、人类科学的难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线索。

序 言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十年的激烈撞击,使他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本书无意重复描绘他们的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试图解析他们的语言信息,俯视他们的源流,以及他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的研究,是在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正式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总体状况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中国的洪钧、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人,于 19 和 20 世纪中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

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

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弊端,可以从贡献卓著的两位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则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和辉煌,继而必有后期的守拙和停滞。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的进取优势面前,一些中国学者往往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中国历史作出许多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特殊性,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即便是在西方语言学科学方法传入以后,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理顺。尤其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倡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于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和开发的假设和理论竟又成枷锁,使中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基本延续性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及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竟而至于,通过语言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关于“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自然是中国人文科学最核心的议题。“汉—藏缅语系”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汉语与藏缅语间的关系;但又使人们忽视了北方诸族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汉语的高度统一性,使我们猜测:它是由许多不同部落语言兼容而成的,在黄河流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和融合活动。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是“动力学”地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及其他语言信息,与后世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着明显的可比特征。大量的证据表明,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地区出走的。它们在北方的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而所谓“西戎”民族又是由“北狄”部落转化而成的。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原因。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藏缅式语言更可能是南方汉语之本,而北方汉语则是在南方汉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认为只有藏缅语与汉语同源的假设是片面的;那些无视北方诸族语言的因素,而仅仅依照藏缅系语言去构拟的“上古音”理论,是不尽可靠的。如若无限延拓它的合理内涵,并且用它去限制人们的思想,我敢预言:其自身将走向“谬误”,而且终将成为贻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又一死结。

就历史科学本身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起初过程。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过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语属信息,来达成某些历史、人类科学的基本结论,是本书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于上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是我的研究的出发，它求证了满族的先祖“靺鞨”或“勿吉”，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东方的源。而“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是我的思考的返归；北方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结论。“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则将马背上的民族西迁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希罗多德记载的年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罗”即是“达斡尔”，可能是“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一文许多令人惊心的结论之一。本书各篇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些虽然注重敏锐之洞察，不少则偏向语音之列举，追求完美的企图无以实现。

为读者检阅的便利，《金史·国语解》、《金史·百官志》、《魏书·官氏志》、《隋书·铁勒传》、《汉书·地理志》作为语言记载，而《新唐书·室韦、黑水靺鞨、渤海诸传》作为史料，都以附录列于正文之后。《辽史·国语解》因篇幅漫长而内容散乱，且多语焉不详，则从略。

在战乱的 1942 年，我出生于流落在广西桂林的一个清白的铁路工程师的家庭，母亲是个美丽慈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1965 年我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于四川的乡间和南京的工厂任教十余载。1978 年，方入得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1978 年移学美国，三年后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又曾于某国立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涉及固体物理学的诸多理论课题。1985 年弃学经商谋生。

我虽曾受自然科学精密研究之训练，却偏志于人文科学玄妙课题的探索。值得庆幸的是，近十余年来得助于夫人张宁华女士的干练操持，身心自由，思维远行。历时五年研究的肇于偶然，始于混沌，朝思暮想，勤于足下；得到过真挚护爱的奖掖，也不乏寓于贬损的激励；终却是广大学人的认同，和回馈自信的喜悦。感谢享

目 录

序言·····	(1)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1)
中古时期欧亚草原上的通古斯人·····	(46)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81)
Hun 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112)
嚧哒与吐火罗斯坦诸族·····	(144)
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	(175)
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204)
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	(231)
关于若干问题的注记·····	(261)
附录·····	(286)
一:《金史·国语解》·····	(286)
二:《金史·百官志》(摘要)·····	(290)
三:《魏书·官氏志》(摘要)·····	(291)
四:《隋书·北狄列传·铁勒》(摘要)·····	(297)
五:《新唐书·北狄列传·室韦、黑水靺鞨、渤海》·····	(299)
六:《汉书·地理志下》(摘要)·····	(305)
后记·····	(312)

图 片 目 录

- 图版 1: 唐代东北亚地区形势 (8)
- 图版 2: 今日黑龙江省阿城和阿什河鸟瞰 (9)
- 图版 3: 足蹬滑雪板的通古斯—鄂温克族青年猎人 (54)
- 图版 4: 图瓦族地区的一个“萨满” (55)
- 图版 5: 阿富汗的一名乌兹别克族男子 (67)
- 图版 6: 阿富汗的 Pushtun 族与乌兹别克族妇女 (68)
- 图版 7: 阿富汗的塔吉克—乌兹别克族混血
青年男子 (167)
- 图版 8: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两名男子 (168)
- 图版 9: 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附近出土的青铜釜 (239)
- 图版 10: 匈牙利 Törtel 地方出土的青铜釜 (240)
- 图版 11: 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通古斯—那乃族家庭 (263)
- 图版 12: 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两个 Cheremis 族妇女 (265)
- 图版 13: 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一个 Cheremis 族家族 (266)
- 图版 14: 哈萨克斯坦 Kara - Agach 地方出土的
“龙”头装饰金器 (269)
- 图版 15: 西夏骨勒茂才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之一页 (281)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作为一个现代欧洲民族, Magyar 人(即匈牙利人)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起源,始终是历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个难题。尽管 Magyar 人已经在印欧人种环伺的中欧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们仍然使用着一种在语辞、语法和韵律上,都与亚洲北方诸族相似的语言,他们的姓氏和称谓仍以亚洲式的姓氏—名字—身份为顺序,如: Arany Janos űr(爱新·亚诺什先生),而与欧洲各民族的习惯相反。可以肯定, Magyar 人是从东方迁移来的许多民族集团中的一个。然而他们的祖源,他们迁徙的动因和年代,以及他们的种族内涵,始终都是一些难解的谜。

西方关于 Magyar 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康斯坦丁(Constatine Porphyrogenitus, 905—959)的一部拜占庭地理—历史著作中^[1]。它提到在 9 世纪末,进据今匈牙利地区的“突厥”部落中,有一个名叫 Megeris 的部落。1896 年,布达佩斯曾经举行过一次 Magyar 人穿越喀尔巴阡山而“征服家园”(匈牙利语 *honfoglalás*) 的一千周年纪念活动。此前,当时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个由历史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一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然而,学者们虽然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但都肯定它是发生在公元 888 到 900 年之间,而 895 年又是一个较可接受的年份。根据这一假设,这一纪念活动,因技术原因于 1896 年举行^[2]。

遗憾的是,早于这一事件的漫长岁月,都成了 Magyar 人的史

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飘忽不定的传说,或极具争议的推测。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学术观点是:Magyar 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和伏尔加—卡玛—奥卡河流域的森林地带;他们与西西伯利亚鄂毕河流域的 Vogul 人和 Ostiak 人,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由于某种不见诸记载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带。在 9 世纪时,Magyar 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结成了一个名为 On - Ogur(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这个名字被邻近的斯拉夫人讹读为 Vengr,而其谐音即是今天世人皆知的 Hungary^[3]。

公元 889 年左右,受到一支后续而来的亚洲游牧部落 Pechenges^[4] 人的攻击,Magyar 人西迁到喀尔巴阡山脉的边缘。892 年,东法兰克王国 Arnulf 皇帝邀请 Magyar 人参与对 Moravia 公国的征战。895 年,拜占庭列奥六世(Leo VI)皇帝又曾利用 Magyar 人反对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在保加尔人和 Pechenges 人的联合进攻下,Magyar 诸部由 Arpad 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据欧洲的历史记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Magyar 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袭击能力骚扰西欧各国,并曾引起西欧地区的一片恐慌。但是在 953 年,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被日耳曼人决定性地击败,此后他们便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从而在文化和意识上开始转化为欧洲居民的一部分。

由于东西方史籍中均无 9 世纪以前 Magyar 人的活动记载,兼之于欧亚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频繁的流动,又没有为考古学留下充分的遗迹。因此,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几乎是研究 Magyar 人起源的不多的几种有效手段之一。在各种关于 Magyar 语的属类和祖源的现有理论中,“乌拉尔语系”是一种较流行却又有颇多争

议的假说。这个假说将匈牙利语、芬兰语、爱沙尼亚语,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总共拥有 2,500 万使用者的,非印欧系、非突厥系的近 20 种大小的语言纳入了这一语言集团中。其中匈牙利语的使用者即达 1,500 万,构成了“乌拉尔语系”中的人口主体。与现今接近湮灭的 Vogul 语和 Ostiak 语(合称“鄂毕—乌戈尔语”, Ob - Ugrians)一起, Magyar 语被划归为“芬—乌戈尔”(Finno - Ugric)语族属下的“乌戈尔”(Ugric)语支。据说“乌拉尔语系”的各组成语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种在 7,000 到 10,000 年前便已存在于乌拉尔山脉北部地区的一种“原始乌拉尔语”(Proto - Uralic Language^[5])。必须指出,这是一种缺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坚实依据的假说;但由于过早地被奉为成熟的理论,它实际上已成为不利于科学地追溯所谓的“乌拉尔语系”诸族真实祖源的障碍。

“乌拉尔语系”中的两大主要语言,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相似程度,有人说接近但略低于英语和俄语之间的关联^[6],也有人说仅相当于英语和波斯语之间的那种极为疏远的联系^[7]。与之相反的是,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 Magyar 语中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蒙古语辞集合,它不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质、动植物、人体器官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初等辞汇,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社会组织、军事、体育和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这不仅揭示了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 Magyar 人的内部必定融含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族的成分,而且还表明了古 Magyar 人一定是在脱离了蒙昧状态之后才离开亚洲东部地区的,乌拉尔山地区只不过是他们到达欧洲之前的一个暂居的营地,而决不是他们的祖宗的发祥之地。

有些学者将匈牙利语中蒙古语成分的来源,归结为突厥语族的中介作用。这实际上是假设 13 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兴

起和扩张,蒙古语言对突厥语世界的巨大冲击,并由此而引发了对欧洲地区语言的次级影响。可是,蒙古语言的力量远不如蒙古骑兵来得强大,除去蒙古地区被彻底蒙语化之外,进入中亚和南俄地区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突厥语族同化^[8]。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言不仅在东欧,甚至在中亚都没有造成过有形的影响。Magyar 语中的蒙语成分不大可能是转手于这个时代的突厥语族,更可能是 Magyar 人自己从远东地区带到欧洲去的。

为证明 Magyar 人起源于远东,我们将中国满族的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语,与现代匈牙利语进行了语辞比较,结果发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关联;而金朝女真姓氏系统与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统,又有更惊人的一致现象。由此我们猜测匈牙利人的族名 Magyar 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亦作“靺鞨”)或“勿吉”的源音,而古 Magyar 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以古代女真语和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

女真—满族,源于唐代(618—907)的靺鞨族,北魏(386—534)时称勿吉(读作“莫吉”^[9]),古称肃慎。1115 年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1125 年灭契丹族的辽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 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17 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Manchu),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 年入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直至 1911 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靺鞨—女真—满族的语言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蒙古语族和

突厥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靺鞨(勿吉)诸部主要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嫩江—扶馀—辽东地区,与当地的属蒙古语族的室韦、契丹以及扶馀诸族混居融合,并与中原地区接触。唐帝国兴盛后,持续地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在辽东和扶馀地区顽强抵抗并曾重创唐军。公元 666 年高句丽王朝宫廷内争,部分王族降唐内应,668 年唐先自辽东地区攻入靺鞨族后方扶馀地区,然后移兵朝鲜半岛,九月间攻陷平壤,高句丽—靺鞨联盟遂战败瓦解。

关于古 Magyar 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在中国史籍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可循。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

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进入渤海。

而《金史·世纪》则称: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所谓“其五部无闻”,应该是隋唐两代对辽东和高丽的连年用兵的结果。高丽—靺鞨联盟的败灭和平壤的陷落(668 年),是导致靺鞨社会分化、重组和迁徙的重要原因。安车骨、泊咄等靺鞨部落抗唐失败而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二百多年后出现于欧洲的 Magyar 人,可能就是大规模西迁的靺鞨人的后裔。

在高句丽王朝覆灭和靺鞨强部出走以后,满洲地区出现过一段和平的时期。大概是公元 700 年左右,靺鞨族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对这个兴盛了二百余年

的北方王朝有如下的记载：“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辖下的十五府，大部又以原靺鞨和高丽各部领地为域界，如：

郑颉府领郑、高二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率宾故地为率宾府……。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

挹娄、率宾、拂涅、铁利、越喜均为靺鞨部名；而“郑颉”无疑就是“靺鞨”或 Magyar 的异译，它可能就是西迁的靺鞨或 Magyar 人的余众居地。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渤海国最盛时（820 年左右）的郑颉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间地区，而郑、高二州分别为今黑龙江省阿城（旧名“阿什河”；或“阿勒楚”，即女真语“金”字之异音）和宾县^[10]，这一带恰是安车骨部的曾居地。府界内粟末水入注嫩江—松花江处，即今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讷”，有人认为那是当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11]。

安车骨和泊咄部之余众被同族类指为“郑颉”，显然是因为它们是“靺鞨”或“靺羯”的核心部落。隋唐两代，他们又是对抗中原帝国的中坚力量。因此，在通古斯系民族内，他们大概是继肃慎、挹娄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军事进取心的领袖部落，盛名震动中原，其余各部亦都以“靺鞨”自冠。只是在他们战败溃散以后，肃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经渤海国和辽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统治以后，于 11、12 世纪之交兴起的完颜女真部，又是发源于这一地区的按出虎水，即今哈尔滨—阿城地区之阿什河。1115 年阿骨打兴立金朝，建都上京，即当初的臈州故地。《金史·地理志》说：

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

韩儒林先生，很早便考定“安车骨”与“按出虎”本乃一词^[12]。唐代“安车骨部”应出自于“按出虎水”。从地望上来看，金代的完颜部及周边女真诸部，应即是安车骨等靺鞨部落之裔，因而很可能与西迁的 Magyar 人同源。

故尔，将现代 Magyar 语，与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语进行比较，是极具史学价值的。而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它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对应关系，应该是 Magyar 人来自远东地区的一种可靠的证据。

一 语词比较

《金史》是一部重要著作，因得金元相交之际中原儒仕领袖元好问及王鹗等人的累积考撰，其学术价值颇为后世史家重视。《金史》全书 135 卷，后附《金国语解》，即金代统治部落的语辞解译。如前所述，这些“金源”部落似与 7 世纪奔散的安车骨部同脉。倘若“安车骨”又是西迁的 Magyar 人的先世之一。那么，匈牙利语和《金国语解》记载的西部女真语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应属意料中事。

《金国语解》收录了金代官称、姓氏和女真语辞共 125 条，其中“人事”、“物类”和“物象”各类辞汇共 77 条，它是 12 世纪西部女真语的一个极为粗略的记载，但也是历史语言学的极为宝贵的遗产。这些女真语辞意义散乱，显然是从各类汉文资料中罗致来的只字片语。然而，这些无关的各类辞汇却构成了一组随机抽样的语辞集合，对于语言比较而言，反而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图版 1: 唐代东北亚地区形势